

文学与语言学互动历史的初步检视

邹志勇

(广州医学院 从化学院, 广东 从化 510925)

摘要:自古以来,文学与语言学就不断地相互渗透、相互推动,二者的关系错综复杂又密不可分。传统语言学促进了古典文学的真正独立和成熟,现代语言学的产生具有深刻的近代文学背景,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次全方位的试验,新世纪的文学研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传统。

关键词:文学;语言学;结构主义;互文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09)02-0050-04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采用审美化的语言,反映各个时代的社会状况,描绘瑰丽的想象世界,表达人类的追求和愿望。通过文学阅读,人们加深了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既获得了审美的愉悦,又促进了精神境界和思维能力的升华。语言在所有人类文化现象中居于首要的地位,可以说,没有语言就没有人。人类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在语言的协助下取得,并且最终凝聚在语言之中。主要借助于语言,人类才得以互相沟通、认识世界,接受和传播人类文明成果。看来,文学与语言有着共同的文化意义——推动人们去认识自我与世界、交流思想和感情,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因此具有了共同的文化目的和旨归。而且,语言学研究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现象,当然也要研究文学语言。那么,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文学与语言学具体是怎样发生联系的?它们究竟怎样相互影响、相互借鉴?

一、古典文学与传统语言学的产生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从时间和逻辑上讲,语言先于文学产生,或者说,实用语言应该先于文学语言(审美语言)产生。中国古代第一部散文合集《尚书》,收集的主要是一些誓词、文告和记事文字。《诗经》受到重视,首先并不因为审美,而是因为实用。先秦贵族除了典礼、讽诵之外,还要用诗来美化言辞、借诗明志。《论语》云:“不学诗,

无以言。”19世纪以前,人们学习和运用语言的主要方式是模仿。古希腊文化界流行“摹仿论”,孔子也强调“学而时习之”^[1]。

适应实用的目的,为了清楚记录事件、有力表达思想,语言学的老祖宗——修辞学首先诞生了。《尚书》云:“修辞立其诚。”最早的文字记录,无论希腊罗马的神话史诗,还是中国的《尚书》《山海经》,《诗经》的早期作品,甚至甲骨文,都具有显著的叙事特征,是一种“精致的讲话”。世界其它民族的早期文献,莫不如此,如我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英国的《贝奥武甫》、俄国的《伊戈尔远征记》等。

由此观之,古人对语言的实用性的关注明显早于对文学(或语言的审美性)的关注。古希腊亚理士多德著有《修辞学》,古罗马塔西佗撰写了《演说家的对话》,专门研究语言技巧,目的是用言辞战胜对方。春秋时期孔子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清楚地表明“言”的目的是“行”,为了“行”必须有“文”。“文”就是一种语言上的修辞技巧。

古代政治家,尤其是外交家,大多接受过语言修辞的良好训练。后来,一些政治家失意了,转而把语言技巧运用于抒发自己的苦闷忧愤之情,创作出样式精美、情感恣肆的文学巨著,客观上实现了文学的真正独立:扬名千古的文学家诞生了,不朽的文学作品诞生了,随后又促生了系统化的文

收稿日期:2008-03-28

作者简介:邹志勇(1970-),男,江西安福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学研究。西方真正成熟的文学始于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国则始于战国末期屈原的楚辞篇章。百余年之后,亚理士多德撰写出西方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诗学》,中国西汉时期则出现了《诗经·毛大序》。在此之前,文学尚未从文化中独立出来,文学语言尚未从文化语言中独立出来,当然也不存在真正独立的系统化的文学研究。柏拉图提出的“理念摹仿说”和“灵感迷狂说”,与中国孔孟的“兴观群怨”和“知人任世”一样,多着眼于关注文学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较少涉及文学的内在特质。

二、近现代西方文学与现代语言学的产生

19世纪下半叶,法国象征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先是诗歌,然后散文,出现一个显著特点:语言的革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代表人物马拉梅说:“不遵循公认的规则一样可以写出诗来……因为语言里本来就有诗存在。”^[2]象征派诗人自觉偏离诗歌的传统规范,大量使用主观随意性的象征形象,高度关注语言形式本身,致力于追求语言的象征性和音乐性。他们的作品把形象、声音、韵律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实际上已经从文学创作中的语言运用,即语言实践的角度,提出了后来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如语言的符号性质、符号的人为性和任意性、符号的所指和能指之关系以及语言本身的审美功能等。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之所以出现在欧洲大陆,离不开当时的文学背景。

“莫斯科语言小组”和“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主要代表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各布森同马雅可夫斯基、赫列勃尼科夫等未来派诗人关系密切,经常以他们的诗歌实践来研究诗歌语言。未来派诗人极力夸大语言的排列和组合形式所带来的诗歌表现力,宣称诗人的权力就在于变革词汇和语法,破坏一切文学常规。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等从未来派的诗歌创作和艺术主张中得到启发,逐渐形成了形式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雅各布森十月革命后移居布拉格,1923年发表《捷克与俄国诗歌的比较》,在书中首次提出了音位学的概念。音位学的建立奠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石。

经典文学对一个民族文化常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然对语言学也产生深刻影响,它不断地提

供语言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莎士比亚的戏剧标志现代英语的诞生,马克·吐温的小说标志美国英语正式形成。鲁迅等人的著作也象征着汉语的脱胎换骨:现代汉语的形成。通过分析经典作品,各国语言学家逐步确立起本民族语言的规范和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语言学实现了文学的文化意义。

三、20世纪文学批评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汇合

1957年,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出版《句法结构》,西方语言学界随之爆发了一场“乔姆斯基革命”,至此,索绪尔在20世纪初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到了巅峰状态。乔姆斯基理论的核心是转换生成语法,其中两个首要概念是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亦称语言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乔姆斯基采用抽象符号化、数学公式化的科学方法,向人们演示有限的深层句法结构如何转换生成出无限多的表层言语现象(即句子),并且归纳出替换、省略、添加、移位等具体的转换规则。受其影响,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结构进行了大量的抽象符号化和数学演绎化研究,企图建立一种类似的“文学语法”(即“叙述学”),来模拟文学生产的具体运作过程。

叙述学代表托多罗夫确定最小的叙述单位为“命题”,一组命题形成一个插曲,一系列插曲形成一个文本,插曲的安排方式有嵌入、连接、交叉等。他在《〈十日谈〉的语法》里说,小说中每一个故事如同一个延伸的句子,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将“句子的成分”(即命题或插曲)连接起来,而故事里的人物可看作名词,人物的特征看作形容词,人物的行为看作动词,从而真正实现一种对文学文本的“纯粹语法分析”。热奈特则把叙事看作是词语形式的特大发展,从语法意义上讲,就是动词不断变化时态、语态和语气所导致的特大扩展。由七大部组成的宏篇巨著《追忆逝水年华》只是“马赛尔成为大作家”这一简单陈述句的扩充而已。总之,一个情节如同一个完整的句子,构成情节的规则如同句子生成规则一样。叙述学家确定了研究对象在各个层次上的基本单位,就像语言学家确定音位、词、短语、句子等语言基本单位一样^[3]。

结构主义批评家不仅重视参照句法的横向组合关系研究,也重视纵向的聚合关系研究。借用

语言学家确定语言成分类别时所依据的对立互补关系原则,他们努力地对自己确定的各个叙事层次(或单位)进行归纳和分类,如什克洛夫斯基的“母题”分类,普罗普的“范畴”和“元素”分类。法国巴特将叙事文本分为三个层次即功能层次、行动层次和叙述层次,不同层次之间有融合关系(即组合关系),而且各个层次本身都有单元分布关系(即聚合关系)。1960年在《语言学与诗学》中雅各布森提出一个著名的定义:“诗学功能就是将同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上”^[4]。“选择轴”近似语言学的聚合关系,“组合轴”对应语言学的组合关系。横纵向相结合的研究体现出现代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批评家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语言学的二元对立法(或对立互补原则)和层次分析法(或树形结构)的借用,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差异与功能的符号化。在他们心中,这种研究与文学的深表层结构研究结合在一起了,由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转化的过程与由语言向艺术转化的过程(即由非文学向文学转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一的。结构主义批评家提倡的科学化分析,打破了文学原有的神秘性,也使先前那种主观随意的印象式批评成为众矢之的,对文学理论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5]。

四、结构主义之后

20世纪60年代,德里达受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从词源学和文字学的角度,试图颠覆索绪尔首倡的结构语言学,开创了颇具影响的解构主义理论。他严厉批评当时流行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说话是一切事物的起源,说出的话比写出的话(即文字)更接近原始思想和本真存在。德里达认为,说话和写作都具有“书写”(描绘)的特征,都表示“不在场的存在”;说话也是写作(书写)的一种,写作才是语言的根源。他高度赞扬中国的汉字:汉字经由“观物取象”的途径创造出来,具有丰富的形象性,真正体现了人类思维的特性。在证明语言符号无法代替“存在”和符号本体具有不完全性之后,他指出:一方面文学文本与它的所指意义之间总是存在差距,评注和诠释成为必要;另一方面,文本不可能有什么终极意义,对文本的阐释是一个层层推进的永无穷尽的过程。因此,文学并不表示真理,文本是符号的游戏,文本的意义不在于文本自身,而必须永无止境地向文本之外去寻求。文学研究的唯一方式就是

“互文性”研究。互文性是不同文本间的相互指涉,是一个既包括时间又包括空间、既历时又共时的概念^[6]。

稍后,受尼采哲学和现象学理论启发,法国福柯创建了知识、话语和权力三位一体的话语实践理论。话语分析不限于语言学的因素,而是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司法、文化、教育等,尤其关注那些权力意志和知识意志的话语。话语是社会思想或意志的物化,它的真理性不可靠,无客观性可言。唯一存在的只有权力或大或小的话语。因此,文学话语根本谈不上什么真理呀谬误呀,文学研究的任务不在于把话语作为一组组符号来探究,而是把它作为系统地形成客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来研究。真正的“作者”不是写下文本的作家本人,也不是客观的社会结构,而是一种组织话语的原则,一种权力的扩散作用(规训)。福柯嘲笑世人:天下文章一大抄,任何名著都是与他人合写的文集,从来就没有单一作者。“一本书本身并没有截然分明的边界,它深深地陷入一个与其它书籍、其它文本、其它句子相互参照的系统之中。它是这个网状系统上的一个突出物……它不能被限定在小小的装订本里。仅仅是在一个复杂话语场的基础上,它才得以凸现并构筑自身。”^[7]

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次全方位的深刻变化。无论是传统语言学在语法、语音、语义、修辞诸方面的旧范畴,还是组聚合关系、深表层结构、符号系统、层次分布等现代语言学新范畴,都在文学研究领域内一试身手。各种新名词、新理论层出不穷,如陌生化、权力话语、歧视话语、话语场等。进入新世纪,全球经济与政治持续地跌宕起伏,文学界和语言学界静寂了许多。人们似乎开始厌倦喧哗与骚动,纷纷转向传统文化遗产,寻觅那种沉静迷人的古典气氛。借鉴计算机语言学的新成果,不少人对经典作品展开了颇具传统意味的文体学、风格学和格律学研究,试图解决文学史上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语言学促进了古典文学的真正独立和成熟,现代语言学的产生具有深刻的近代文学背景,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次全方位的试验,新世纪的文学研究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将会实现一定的突破,亦可能在一定程

度上回归传统。对语言学的重视扩大了文学家和批评家的视野,启发了文学的新思维,促进了文学研究的科学化、规范化。同时也存在很多生搬硬套的现象。吸收语言学成果时,需要对其加以相应的改造,以适应文学研究的目的。坚持把它作为阐释文学作品的工具,阐明文学规律的工具,才可能有成功的文学研究。事实上,在语言转化为文学的创作过程中,作家不仅对语言本身下功夫,更投入了炽热的情感以及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入探索和思考。粗略地考察文学与语言学的互动历史之后,却感受到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根

本差异,犹如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交织着人类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困惑。从学科建立的目的看,文学运用语言以寄托人类的生活理想和追求,文学研究倾向于一种审美的、诗意的研究。文学的作用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人类前进的方向和步伐。语言学研究语言更着重于实用,目的在于更好地掌握语言,更好地为现实生活服务,因此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尽量摒除个人的主观意志情感。这种“诗与真”的差异亦体现在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在中国先秦时代的老庄与孔孟之间。

参考文献:

- [1] 祁寿华. 文学[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50.
- [2] 伍蠡甫. 西方文论选(下)[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256.
- [3] 乐黛云. 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12-113.
- [4] Sampson, G. Schools of Linguistics[M]. Stanford:Stanford Univ. Press,1980:76.
- [5] Robins, R. H.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M]. London:Longman,1997:15.
- [6] 徐友渔. 语言与哲学[M]. 北京:三联书店,1996:10,215-228.
- [7] 赵一凡. 欧美新学赏析[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09-111.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Interaction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ZOU Zhi-yong

(Conghua School, Guangzhou Medical College, Guangdong Conghua 510925, China)

Abstract: This is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ical interaction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It mainly discusses three topics: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advancing the independence of classic literature from general culture, modern linguistics greatly indebted to modern literature, and the linguistic transition in the 20th century's literature study.

Keywords: literature; linguistics; structuralism; intertextuality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丁 一)